

“自然力量”与“机械力量”的对抗 ——论诺曼·梅勒的小说《裸者与死者》

黄铁池

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的成名小说《裸者与死者》出版于 1948 年,至今已将近 50 年。这部小说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炮打响,引起了轰动。《纽约时报》书评权威奥维尔·普雷斯科特(Orville Prescott)在 1948 年 5 月 7 日,也即小说出版没几天后就发表文章,称《裸者与死者》是他所读到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印象最深的作品”,并预言梅勒将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大作家。第二天,另一位书评专家马克斯韦尔·杰斯马(Maxwell Geismar)在《周末评论》上说:“正当我们停止了再谈 50 年代的文学成就时,它却显出了新的方面。”他称梅勒是一位成功的新作家。第三天,即 5 月 9 日,《纽约时报》书评版又有戴维·丹伯西(David Dempsey)撰文赞扬这部小说“毫无疑问是描写最近的冲突中最有力的作品。”5 月 10 日,《时代》周刊把此书称之为能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媲美的巨著。而同天的《新闻周报》说梅勒“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作家。”在这一片赞美声中,《裸者与死者》的销售量急剧上升,1948 年夏天,雄居美国最畅销小说之榜首。

但是,尽管如此,有关这部小说的争论似乎也没有中断,时至今日,仍有一些文学评论家怀疑“它的许多成就仍然未被人们充分地认识”,“它还有更重要的,不同于一般的地方。”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它究竟是部什么样的小说?它经久不衰的魅力何在?迄今尚未有定论。

有人称《裸者与死者》是一部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杰作,是一部历史文献性的作品,认为它是作者在二次大战中军队生活的真实记录。对此,梅勒本人并不同意,他承认采用了一些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但又认为与其说它是一部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小说,还不如把它看成是如同麦尔维尔的《白鲸》一样的象征性的作品。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表达存在主义思想的小说,意在说明战争的残酷与荒诞,人生的虚妄与无望。这在小说的内容特别是结局和人物的经历中都可以看出较为明显的痕迹。而事实上,50 年代正是存在主义思潮风靡西方的时代,许多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梅勒也不例外。但综观全书,确切地说,它只是具有一些存在主义思想的倾向,但绝非主旨。

更多的人则把《裸者与死者》看成是一本反映二次大战的战争小说或“反战小说”。因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梅勒确实以二次大战作为小说的背景,描写了美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但是,如果把《裸者与死者》看成是单纯的战争小说的话,那无论在战争场面的描写和历史背景的阐述等等方面,这部小说都不比其它这类作品来得出色。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二次大战的敌方——日本军队在小说中几乎没有正面的描写。针对了这种普遍的看法,梅勒本人也因此申辩说“开始的时候,我从未想过这是本反战小说。”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部以二次大战为背景的小说,它与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倒更为接近,二者有异

曲同工之妙。

那么,这部小说真正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什么地方引起读者更多的兴趣呢?这个问题连梅勒本人的解释也显得语焉不详,他曾在《自我广告》一书中回答读者说它是一部充满了希望的“有关人在历史中运动的寓言。”这种抽象的,含糊不清的说法并没有让读者感到满足,相反,引起了人们更多的猜测,也导致了许多的不同解释。

事实上,要探讨小说的真正含义和价值所在,发掘它“不同于一般的地方”,我们最好还是回到作品本身上来。

《裸者与死者》的情节并不复杂,讲的是二次大战中南太平洋近菲律宾的一个叫“安诺波贝”的小岛被日军侵占,美军上将卡明斯奉命率领一支六千人的部队夺回该岛。小说把焦点聚集在这位将军的指挥部和一个由有十二个战士组成的侦察排。特别突出了四个人物,除了卡明斯上将外,还有他的助手霍恩中校,侦察排排长克罗夫特及战士瓦尔生。由他们四人构成了二对矛盾:将军卡明斯与助手霍恩中校在思想意识方面处于对立状态,而排长克罗夫特又与处处顶撞他的瓦尔生作对。卡明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与尊严,把霍恩派到克罗夫特的侦察排去负责一次极其危险的敌后侦察行动,这样又使霍恩中校陷入了与克罗夫特的紧张对峙之中。克罗夫特对中校的到来表示了极大的敌意,这不仅是因为嫉恨而且还由于彼此之间观念上的冲突以及他鄙视霍恩那种混淆了军队上下级之间关系的做法。因此,在侦察行动中克罗夫特有意让中校暴露在日军的火力之下而丧生。与此同时,克罗夫特又处处对瓦尔生施加压力,在他长期的攻势下,瓦尔生终于屈服畏缩。小说的结局令人深思,这次付出了惨重代价,包括几个人丧命的侦察行动实无必要,因为就在他们拼死拼活企图越过高山的时候,日本军队已经被击垮。当这些垂头丧气的残存者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基地的时候,才听到了这一消息。

整部小说的情节在几个层面上同时展开,一是军队要征服大山,执行侦察任务但最后没有达到目的;二是军队内部的种种矛盾与斗争,在这个层面上又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作为军官层的卡明斯将军与霍恩中校之间的对抗,另一条是基层侦察排中克罗夫特与瓦尔生之间的冲突,而全书又通过对霍恩中校惩罚性地“下放”到侦察排而干净利索地把二条线索串在一起。

从小说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真正的本意并不在写美军与日军之间那场残酷的战争。如果我们把小说中二个最重要的象征——大山与军队看成是二种“系统”或二种“力量”之间的较量。那么,全书的意义就清晰明了了。美军一心想征服的阿那卡山峰高地耸立在安诺波贝岛的中心。它是一种“自然力量”的象征,而它的对立面,即由卡明斯将军和克罗夫特率领的军队则是“机械力量”的象征。这两种力量在另一个层面,也即在军队内部则由代表了具有法西斯极权主义思想倾向的卡明斯将军和克罗夫特排长与崇尚个性完整,追求民主思想的霍恩及瓦尔生之间的对抗而构成。

在小说中,所谓的“机械力量”,指的是战争、军队、武器及这种力量的化身,美国工业主义者原型的卡明斯和克罗夫特等人。而“自然力量”即是大山、丛林及代表了民主自由思潮的霍恩、瓦尔生等人,两者在这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是小说真正吸引读者的地方。

卡明斯将军是一位“卓越”的军队指挥官,毕业于著名的西点军校。他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是冷酷与无情,是一个只看重“力量”的偏执狂,也是权欲与控制欲极强的铁腕人物。他出身于中西部富有的人家,父亲从小就教会了他这个社会里通行的“狗吃狗”的生存原则,并告诉他美国社会是建立在“恨”与“恐惧”的基础上,说这是一条不变而有效的原则。当他成了一名美军指

挥官以后,他急于要用这套所谓的“恐惧阶梯”的理论来治理他的军队并设想将来用以治国平天下,特别是对付战后与苏联的冷战,明显地带有法西斯主义思想倾向。他的这种理论遭到了他年青的助手霍恩中校的抵制与反对,二人由争论而渐至对抗。霍恩虽然与他一样出身于一个中西部富有的家庭,但他就读于哈佛大学,更向往民主思想,他成了自己家庭的反叛者,从他父亲残酷的物质主义下逃了出来而投入一种自己也搞不清的人道主义。他在赴安诺波贝的途中曾敏感地意识到正直的青年人在这个一切都“机械化”了的美国社会里是毫无希望的,他相信所有聪明伶俐的青年人都会在年青的时候被什么东西撞得头破血流而那东西却完好无损,这正是他向卡明斯将军的权威挑战结果的隐喻。

霍恩上校与卡明斯上将的冲突是军队上层的意识对抗,在小说中,这种对抗也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刚开始时,霍恩对自己的上司甚至还有几分崇拜,并且也受到他迷恋权力的影响,而将军对他也常常显得前后矛盾并隐隐约约地显出一种同性恋的态度,时而残暴,时而亲切。而随着卡明斯不断地宣扬他那一套强权理论,逐步暴露他那“机械”式性格之后,使那个非常惧怕个性丧失的霍恩中校忍无可忍,他们之间对抗是不可避免了。霍恩最反感的是卡明斯所强调的在军队中个人必须从属于机械(军纪、武器等)的理论,也反对他运用“恨”与“怕”的手段来统治军队,甚至对他那种冷若冰霜的生活方式也不无讥讽。因此,他很快成了卡明斯将军的眼中钉、肉中刺。这种对上帝的权威的挑战是将军绝对不能容忍的。他把霍恩的言行看成是军队中一股威胁他权威力量的代表必欲置之死地。正如他曾告诫过中校的,“权力中重要的一点是,它只能自上而流下,如果在中途遇到任何障碍或反抗,那只会引来更强的力量,把它打得粉碎。”(“The Naked and Dead” Rinehart and Company, inc, NY. P323 下同)运用这条原则,他毫不留情地惩罚了霍恩,把他调到克罗夫特的侦察排去负责一次非常危险的行动而导致了走向死亡。

在小说中,卡明斯的形象完全是按照“机械力量”的化身来塑造的。他被刻画成象一架无情的机器一样,冷漠高效,强壮有力。他可以一刻不停、几个小时地考虑问题,“甚至连地图也不看一眼”,他有充沛的精力,可以毫无倦色地不懈工作。他注意力高度集中,对部下了如指掌,犹如一架电脑一样精确无误。作者暗示,卡明斯的能力是常人无法企及的。而且“他无论在那儿,没有活生生的气息”,他的帐篷中简朴无华,行军床折得象是没人睡过的,办公桌上有条不紊连帐篷的地板上也一尘不染。他“那台灯的灯光穿过长长的对角线投阴于帐篷内长方形的物体上,看上去就象一幅抽象画”。(P172 同上)这一切表明,他与别人不同,他没有人的“迹象”。

就在这空荡荡的,没有一丝生气的帐篷里,卡明斯将军展开了他的“机械”理论并积极地用于他所控制的军队。他全部理论的基础就是基于用权力来控制“混乱的现实”。在他看来,军队即是未来社会的缩影,而控制军队最好的方法是用“恐惧阶梯”,“当你害怕你的上司,你说会做得最好而蔑视你的下级。”这正是机械社会特殊的哲学,他进一步露骨地说“机械技术在这个世界里必须加强和巩固,只有这样你才会有恐惧感,因为大多数人都必须服从于机器,而这并非他们本性所愿意的事”。

卡明斯扮演了“机械力量”的象征,也是这种力量的产物。当他用他那支心爱的火枪开火时,浑身感受到一种机械力量的高度兴奋,(P566)自称“我感受到了一种久等的紧张。”他把个人看成是机器的附属品,“换句话说,在战斗中,人与机器的关系超过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把整体的人视为一种机械的力量,他说,“战斗是成千上万的人与机械组织起来的冲锋陷阵。”正因为如此,他对机器的崇拜超过了一切。在他看来,机器的力量,它的价值,不仅仅是控制军

队,控制政治的有力工具,而且已经渗入了一切之中。很显然,卡明斯这种机械至上论已经构成了对自然及人类人性完整的严重威胁,他是美国极权主义思想一个典型代表。在这种思想的鼓动下,他自认为可以压倒一切障碍,无论是自然还是人。当我们看到卡明斯将军那张披在身上的人皮渐渐剥落之后,他实实在在是一只赤裸裸的动物。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引人注目,那就是霍恩中校面对卡明斯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式的暴虐言行,存心在他的帐篷里丢下一烟蒂以示抗议。此举被卡明斯知道后,马上显露了他极为凶恶的本质:“如果他这个时候手中牵一只动物的话,他会马上勒死它。”他把霍恩找来,在一顿辱骂与威胁之后,又侮辱性地要他把烟蒂拾起来,否则将受军纪处罚。这几乎可以说是他们之间的一场公开的、白热化的斗争。霍恩作为一个军人,一个卡明斯理论的反对者,他不愿接受这个侮辱性的命令,但慑于将军铁的意志,严酷的军纪及他那双布满了血丝的眼睛,霍恩不得不退缩。他的这个“反叛”行为直接导致了卡明斯惩罚他的决心。

同样,人与机械的斗争也在克罗夫特与瓦尔生之间展开。克罗夫特是卡明斯的追随者,他们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外,有时简直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也是一个强硬派人物,一个权欲迷,一个向往以“恨”来控制他人的野心勃勃的人物,而且还同样有着同性恋的倾向。而最突出的,他也是一个相信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来征服世界,征服他人的人。他的至高名言是“我仇恨一切不属我的东西。”克罗夫特处处显得阴冷,“窄窄的三角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又硬又小的颌部没有多少肉,尖削的脸腮,又短又直的鼻子,细细的黑发……”从梅勒对他的外表的描写就几乎令人看到了一尊冷冰冰的机器人。而瓦尔生则与他相反,是一个活泼的,血色红润的热情小伙子,“脸上生了雀斑,有一头红发。”他坎坷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渴望自由与个性完整的战士。瓦尔生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在参军以前常用流浪汉式的生活逃避现实世界中机械力量的威胁。他从十四岁起为了挑起家庭的重担不得不当了一名矿工,在那地下几十米的深井里,几乎没有立足之处的矿道中用极为笨重的钻机采矿,常常还要被又烫又湿的矿石绊倒。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用胸膛把钻头顶进矿石中。就这样一天干十小时,一周做六天,只有在星期天的时候才能见到天日。他是“机械力量”的受害者,他的青春就是在煤屑和机器声耗尽的。战争爆发后,他从美国社会的底层来到了军队,期望呼吸到一种新鲜的空气,摆脱几乎迫使他发狂的机器的束缚。但是他错了,当他来到了安诺波贝岛以后,发觉自己已陷入一架更大的机器(军队)之中。他与克罗夫特的争吵在书中很早就出现了,他常常敢于得罪、顶撞这位排长,向那些不合情理的军纪挑战,在这个岛上,生命对他来说唯一的意义就是竭力保护自己自然人性的独立,反对克罗夫特的权威,就象霍恩对卡明斯一样。

在权欲与狂热的鼓舞下,克罗夫特不惜任何代价要争取侦察任务的胜利完成,他一次又一次地驱使手下的人冒险登山。为了执行将军拟定的军事计划和表现他的战斗才能,他冷酷无情地不顾客观条件而要战士接受他铁的意志。这个人物在小说中被描写得完全丧失了人性,是一个施虐暴戾的人物。他曾经在逗弄了一个日本犯人之后开枪打碎了他的头颅,他也是霍恩中校不幸中弹的精神上的谋杀者。他蓄意让中校去送命是因为后者威胁到他脑子里的上下秩序和极权主义思想。作为霍恩之死的预兆,他在丛林中一手捏死了一只活生生的小鸟。在六天六夜的艰若跋涉中,克罗夫特的人性已完全淹没于无情的“机械性”之中,也是在他这种狂暴的进攻之下,瓦尔生的斗志逐渐消融,最后不得不低头屈服。

霍恩与卡明斯以及克罗夫特与瓦尔生之间的对抗,完全可以看作是当时美国社会中两种思潮和两种力量较量的反映,梅勒把军队中和社会中的权威主义和个人完整的丧失连系在一

起。从这个视角看,似乎自然个性的力量远不是机械强权力量的对手。但是,事实并不然,这仅仅是局部的对抗和冲突,是作家忧心忡忡的地方,而在另一场背景更为广阔的斗争中,则情况正相反。

阿那卡山峰是安诺波贝岛上最高的山峰,远远望去,一片紫气缭绕,神秘莫测。它的表面复盖着密密的热带丛林。它是小说中最重要的象征。这座孕育了无数有机世界的山峰显示了“自然力量”的伟大与生机勃勃。卡明斯为了试探敌军的虚实,命令侦察排必须越过阿那卡山峰插入日军敌方,这样,使“机械的力量”与“自然的力量”进入了直接对抗的局面。虽然由霍恩与克罗夫特带领的侦察排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们碰上了真正的对手。阿那卡高峰对克罗夫特来说就象军队对卡明斯将军一样,是一个不受控制的对象。要在这布满了荆棘的丛林中开道前进几乎是不可能的,梅勒在书中写道:“没有一支军队,能够生存、活动于其中。”克罗夫特以他特有的狂虐之情,一心征服这座大山。他驾车一头冲了进去,但却遇到了自然力量的有力抵抗。克罗夫特先是感到四肢麻木,接着又在河中碰得浑身青肿。这变幻莫测的丛林中到处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好似破烂抹布的臭味,令人头晕目眩。最后,克罗夫特又不小心一脚踩在蜂巢上,大群的黄蜂围攻上来迫使这个邪恶的战争狂人退了下来,终于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他“不断地看着这座山峰,他失败了,失去了截露头角、自我炫耀的机会,失去了自我和别的、甚至生命及一切东西。”(P709)

因此,我们若从这个总体的意象上看,在这场两种力量的交锋中,无论是卡明斯还是克罗夫特都不是胜利者,也不是英雄。他们虽然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击垮了各自的对手,但在代表了永恒的“自然力量”面前却显得渺小无力。最后连卡明斯也感到了无可奈何并自己觉得无所事事。这正是这部小说高于一般反战小说的意义所在。可以说,《裸者与死者》表现了梅勒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即“人类正处于一个堕落与混乱并到了无可救药的状态”,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存有对较为美好的世界的企望”,说明人类的历史、美国的前途并不会象卡明斯所想象的那样,他与克罗夫特最后的失败证明了“机械力量”作用于人与自然的破产,从而肯定了人的尊严、自由与个性的完整。

曾经有人问诺曼·梅勒,你最恨的是什么样的人?他坦率地回答:“是那些有权力而无同情心的人,也就是没有一点人性的人。”(《自我广告》P271)我们决不能忽视了这句话与卡明斯和克罗夫特间的联系。

至此,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与重要价值明确了,它否定了法西斯军国主义式的极权主义及这种“机械”的力量,同时肯定了各种自然的本性并揭示了人们在现代社会中与剥夺个性的力量作力争的状况。

应该看到的是,这种描写自然文明与机械文明、人与武器的对抗是美国近代文学中的一个传统,它在以往的许多作品中并不鲜见,无论是诺里斯·玛根、舍伍德·安德生还是海明威、多恩帕索斯甚至德莱赛的作品中都可以见出端倪,而诺曼·梅勒在《裸者与死者》中把它结合了更为重大的背景——二次大战又加以尽情表达,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兴趣与关注。

《裸者与死者》是诺曼·梅勒的第一部作品,虽然有的读者抱怨小说的结局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印象,似乎觉得还不够完整,但本书严肃的主题、思想的深度及前瞻性是令人赞叹的。今天,尽管人们对这部小说的性质还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至少有一点是众口一致的,即当时年仅25岁的诺曼·梅勒以他的《裸者与死者》一书,可以毫无愧色地跻身于美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列。